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四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四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四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蒙古人民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文史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 7 字数 172千字

1990年12月第一版 印数 1—5000

目 录

- “反帝大同盟”在绥远省活动点滴……………武达平（1）
- 一个普通战士的回忆——太原成成中学师生
- 抗日游击队一年生活的回忆……………朱志国（11）
- 我在内蒙古地区民贸战线的经历
- ……………林蔚然忆述 张士耕整理（83）
- 回忆经棚县的开辟工作……………陆 楝（113）
- 我走过的路……………旺 丹（130）
- 绥东地区剿匪记实……………郭金和（189）
- 平津战役中的八纵队……………裴周五（210）

“反帝大同盟”在绥远省活动点滴

武达平

“反帝大同盟”全名为“反帝国主义大同盟”。1927年由宋庆龄、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人发动成立的。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是一个国际保卫和平组织。“中国反帝大同盟”在上海设有总部，北京、河北等地也建立了组织。它的宗旨本来是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应该名正言顺，光明磊落。但在中国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却不能公开活动，被迫处于地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性外围组织。与共产党一样采取隐蔽的形式，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蒋介石、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现略述一下“反帝大同盟”（以下简称反帝）在绥远省的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杜如薪（原名杜翊）同志与进步知识青年苏谦益等，出于爱国主义义愤，在中山学院（当时他是学生）创办了油印刊物《血腥》，揭露日本侵略者，号召抗日救亡，反对蒋介石坚不抵抗主义。1931年寒假，绥远省立第三小学校进步校长邀请杜如薪同志任教。杜为便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又设法请苏谦益、马麟一同到了省立第三小学任教。将《血腥》改为铅印，开展宣传活动。

1932年6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文化总同盟”派人率话剧团，来归绥演出，宣传抗日。盟团中邸俊英（即邸力，回族，萨拉齐人）与杜如薪、马麟相识，通过邸力与李佩衡（李

树芬）、于伶（老任）接上了关系。杜如薪同志又和苏谦益、马麟联系上，于4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杜如薪、苏谦益、马麟、于伶、李佩衡、邸力秘密集结于公主府南（今立交桥东边）一个大仙庙中开会，成立了反帝绥远省委，归河北省反帝大同盟领导。

反帝省委的领导班子，由杜如薪任书记，苏谦益管宣传，马麟管组织，杨叶澎（原名杨茂盛）、杨国兴为常委。反帝省委成立后，首先由杜如薪、苏谦益、马麟、杨叶澎、杨国兴分别先后在中山学院、绥远省立第三小学、绥远省第一中学、绥远省立第五小学、绥远师范、铁路扶轮小学、绥远职业学校及其他中小学师生中，开展活动，发展反帝及其党的地下组织。这些组织除开展一般的各种方式宣传抗日救亡，反对蒋介石“坚不抵抗”主义外，还以公开方式组织读书会，在各学校组织抗日救亡会，在中山学院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杜如薪、苏谦益组织“绥远剧社”，杜为社长，演抗日救亡戏剧，通过读书和演剧，扩大救亡宣传。杜如薪等同志继续编辑出版《血腥》，后改称《血星》，意寓红星，作为绥远反帝大同盟的机关刊物。不仅宣传抗日救亡，而且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苏联十月革命等。

1933年4月初，反帝省委曾派韩燕如代表绥远反帝到北京参加河北省①反帝大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藉以推动绥远反帝工作。该会决定由原重点在学生中做工作扩展到工运、兵运工作。随即杜如薪同志到面粉厂、小东街车厂、大有恒地毯厂做工人工作。苏谦益同志派人到小教场传送传单做士兵工作，还有人做铁路工人工作。杨叶澎、韩燕如做洋车夫工作。绥远反帝除在学生群众中做工作外，还在中、上层教师中做工作取得同情支持。如杨令

①河北省当时行使北方局的职权，主管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陕北等数省区的工作。

绥远反帝大同盟亦归河北省领导，故参加其所召开的会议。

德、宋介之、宋志刚、王文光、朱静雅、马映光等人士。他们都是使我们敬佩怀念的良师益友。如宋介之，他为人刚直不阿，有正义感，有爱国心，仇恨日寇侵华，思想进步（其侄宋守道为中共党员。宋守德为反帝大同盟盟员）学识渊博，故我们在学校中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时，请他做指导，以后反帝组织被破坏时，他掩护伍子良及我离校出走，后来又收我们返回读书。英文老师王文光也是思想进步、同情革命，他出席参加我们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成立会，他用自己的衣帽化装掩护安吉人同志安然离校。以后，我们埋藏在破屋里的革命文件、刊物、书报等被人翻出后，王老师竟要去阅读，真够大胆的。解放后，他在山西省工作。马映光任绥远省立第三小学校长，掩护参加革命活动的教师杜如薪、王炳熨，资助杜如薪所办刊物《血腥》的印刷费。杨令德明知杜如薪及我是左倾分子，但愿接近支持我们的活动。朱静雅支持我们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出席研究会成立会。总之，上述各位老师、人士都是同情革命，支持我们的爱国者，值得我们敬仰怀念。

兹将在归绥各中、小学及外地的、我能了解到的反帝大同盟盟员及党员，列述如下：

在绥远省立第三小学的有杜如薪、王炳熨、赵维新。绥远第一中学的有韩燕如、杨叶澎、杨国兴、李作栩。在中山学院的有苏谦益、任子良、安吉人、杜琰、宋守德、赵守仁及我。在绥远师范的有吴殿甲。在省立第五小学的有何继忠。在铁路扶轮小学的有李迪九。在归绥火车站的有何继武。在职业学校有一个小组。在包头的有朱葆光。在固阳县的有侯清如等。总计各学校、各地共约有盟员、党员50人左右。

上级党委河北省委很重视绥远反帝工作。于1932年初冬，有

当时在北京学习的李亮明^②，他了解杜如薪同志，了解绥远反帝大同盟的革命活动情况。由他从北京介绍杨一帆^③同志、张璋同志来归绥和杜如薪同志接上了党的关系，杜又找到苏谦益、马麟、杨一帆等同志在中山学院对门小院内开会，汇报研究了绥远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杨一帆同志很赞赏绥远反帝做的工作，并作了进一步布置。特别强调要发展党的组织，这一时期发展了苏谦益、杨叶澎入了党。再往后，发展了杜璉和我入了党。当然在其他学校也发展了党的组织。

到1933年，杨一帆同志又主持成立了中共归绥中心县委。由杜如薪同志任书记，苏谦益同志管宣传，马麟同志管组织。从此，绥远反帝省委的工作由中共归绥中心县委领导。以上二组织皆由河北省委领导。

1933年初李亮明也从北京回到绥远参加绥远反帝及党的领导工作。

当时反帝处于地下活动时期，不发生横向的关系，故我对其他学校同志们的具体活动，不甚了解，只能如上轮廓的提提。

②李亮明原名李生旺，又名李达光，内蒙古托克托县人，曾就读于绥远师范学校，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多年做地下工作。此人为革命历尽艰辛，受苦受难。1937年秋，曾在山西平鲁县被国民党逮捕，后由牺盟会韩燕如等同志营救出狱。某年曾在归绥被国民党逮捕，机灵地争取了看守人，被放逃出。1938年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后，任游击第二支队参谋长。后在家乡养病时，被国民党逮捕，惨死于监狱。

③杨一帆，原名杨继善，江西省人，曾留学于法国，著有《中国社会解剖》（亚东书局出版），任中共河北省委军事部长，1932年初冬至1933年春，在归绥检查反帝省委工作，发展党员，组织中共产归绥中心县委。继到包头、河套等地开展工作，不幸在包头被国民党逮捕。1933年6月，患痢疾，病故于绥远地方法院看守所。

现就中山学校里的前后共发展为七人的反帝活动略述如下：
这七人就是苏谦益、任子良、安吉人、杜琰、宋守德、赵守仁及我。

我参加反帝是于1932年冬，经苏谦益同志介绍的，当时他是中山学校附属小学教师，我是中山学院高级师范部学生。工作、学习在一个大院中（今新城南街路东一号大院路北是中山学院旧址），经常接触，我们俩又是托克托县同乡，较了解，所以他敢于向我宣传、发动参加反帝。

我参加反帝后，我又向同班同学任子良、安吉人二同学宣传、发动。我们三人都仇恨日寇侵华，愿携手抗日救亡。都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腐化、反动、坚不抵抗主义不满，任子良同志欣然参加了反帝。安吉人同志在北京已参加了反帝。这样我们三人真算志同道合了。我们六人组成了一个小组，我任小组长，从此，三人就开始了工作，活动比较积极，配合得也比较好。

因反帝处于地下，反帝盟员互不发生横向的关系，所以，只我一人和苏谦益同志取得联系，进行布置，汇报工作，他们俩不和苏谦益发生关系。他俩发展的盟员也和他俩分别另行活动，不和我发生横向的关系。虽然如此，但是活动过程中，往往是心领神会，心心相印的。

中山学校反帝活动，最初是安吉人、任子良及我三人，相继安吉人同志又发展了宋守德、赵守仁二人。以后的活动就是五人的活动。再加杜琰同志，当时杜琰同志已是党员又是反帝盟员和我们不发生横向的关系，但和我们参加各种活动。这样以来，就是六人的活动了。再加上总领导苏谦益就是七人的活动了。

我们虽然是反帝盟员，组是看的文件，书刊却是由北京通过邮局内的地下交通寄来的党内文件书刊。如：北方红旗、共产党宣言、国际歌、反帝新闻、青年之友、战士之友、论左派幼稚病等。所以，当时接受的教育是党的教育，我们宣传的方针、政策、

宗旨也是党的当时的方针、政策。

我们曾在学校同学中，宣传发动同学们组织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在研究会成立时，还邀请训育主任宋介之、英文老师王文光、语文老师朱静雅出席会议，支持我们的活动。并请宋介之老师为指导，他亦乐为。

争取学校学生会的领导权。中山学院原有学生会，1932年春改选时，我们反帝盟员、党员联系发动进步同学，竞选学生会领导权。当时竞选对象是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在选举之前，我们反帝盟员、党员及所联系的同学分片活动进行联络竞选，结果获得学生会领导班子的绝大多数席位。即安吉人、任子良、杜璉及我全被选入，学生会基本上被我们掌握了。这就在学生活动中起到了左右学生会活动的作用，能使学生会发挥宣传抗日救亡的效力，并开展武装群众参加抗战的工作。在学生会中设置了“义勇单股”，由杜璉任股长。对宣传动员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等抗日救亡工作，杜璉同志是非常积极的。有一次的宣传材料是由杜璉同志起草的，内容是国民党在困难当头时刻，醉生梦死，贪图享乐，腐败反动等，写得非常具体生动，鼓动性强，很有吸引力。

另外在“五·四”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还以反帝盟员、党员为主力，在学生会中、同学中宣传、鼓动，酝酿成立“绥远省学生联合会”，以迎接“五·四”。后反帝、党的组织被破坏，此事未成。

我们反帝盟员、党员对抗日救亡活动是很热情积极的，随时随地利用各种机会向同学、社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宣传内容除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起来，进行抗日救亡外，还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坚不抵抗”主义，提出“打倒国民党”并写为“打倒刮民党”，“打倒蒋介石”写为“打倒蒋该死”，“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武装民众抗日救亡”

等。

宣传方法是采取印传单、写标语、口号、讲演等方式。发传单有一次采取了冒险的方法，把传单散发到省政府卫队处，扔到新城警察五分局院内。还有往电灯杆上贴，或者往墙上写、贴，还在新城东北角城楼上写。还有把标语、口号团成纸蛋，骑自行车往街上撒，在戏院散戏时，人群走散时往人群撒……等办法。发传单、写标语一些活动，多在晚上挤时间进行。还采取口头宣传，我们曾在旧城入市街向广大群众，作抗日救亡宣传。广大群众听后很受感动。

我们秘密活动的地方很多，当时新城有城墙、城门。在南门外，现内蒙古医院北墙外的小河，以及墙外西北角小桥上，曾是任子良、安吉人及我接头汇谈、分析形势、研究工作的地方。现在党校一带，当时是南城墙西边墙外，曾是杨叶澎和我接头汇谈，研究布置工作的地方。新城西南角内，当时有一个小公园，今新城宾馆附近，是杜琰和我活动过的地方。

还有中山学院对门一小院，这是一特殊活动的地方。所谓特殊，就是这个院子的主人张恒孝是国民党的视察员。他经常不在家，而只有张母在家看家，而张家与杜如薪同志是亲戚，我们利用亲戚关系多次借他家房子接头开会。

绥远反帝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中旬在各学校的具体活动，我虽然不了解详情，但从总的工作形势来说是非常活跃的，把归绥抗日救亡，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坚不抵抗”主义等革命空气搞得热火朝天，空前高涨，活动是有成效的。话说回来看，就因为闹的轰轰烈烈，其中有些反帝反蒋的方式方法检查起来，其缺点有些受左的影响，表现的颇明显露骨，不够隐蔽，惹人注目。处在当时蒋介石国民党的“坚不抵抗”主义、“抗日有罪”、“奢言抗日者杀无赦”、“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围剿红军，镇压白区的抗日民主斗争”的高压政策下，必然会引起国民党反动

派、警察局等敌对方面的警惕，他们注意加强了防范，加强侦破工作。

1933年4月反帝省委正值布置、准备在旧城大观园剧院召开大会，纪念“五·一”，宣传抗日救亡，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坚不抵抗”主义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时。由于绥远第一中学的韩燕如到北京参加河北省第二次反帝代表大会回来后，执行新的开展工运任务。他与杨叶澎二人到洋车夫住宅处向洋车夫宣传动员他们组织抗日工会，工人们同意组织。不料被人告密，当第二天韩、杨又到工人住宅外进行工作时，被等候他们的便衣警察带到警察局。在杨身上搜出了国际歌，在韩燕如身上搜出了反帝标语。这样警察局抓住了证据，逮捕了杨叶澎、韩燕如二同志。反帝工作遭到了破坏。

1933年4月15日，绥远第一中学的杨叶澎、韩燕如被捕后，16日早，中山学院的苏谦益被捕。16日晚又到中山学院追捕杜琰、安吉人未遂，以后到清水河县又逮捕了杨国兴。这样一来学校中的党员、反帝盟员纷纷离开归绥。反帝省委、中共归绥中心县委及学校的党与反帝的革命活动，就此上下级组织与个人之间失掉了联系。

在绥远的反帝革命斗争，从组织角度来说，虽然被破坏，党员、盟员与组织失掉联系。但从反帝盟员及党员个人来说，离开归绥后，仍然矢志革命，受挫而不气馁，设法找党接头，继续进行革命的大有人在。这些同志到抗日战争前走上公开化，奋臂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

特别值得提的是，被捕的党员、盟员韩燕如、苏谦益、杨叶澎、杨国兴几位同志，他们在敌人监狱中，精神肉体惨遭折磨。但是，他们忠贞不屈，视死如归，立场坚定，不畏强暴。在狱中设法和王若飞同志取得联系，进行监狱斗争。刑满出狱后，他们先后奔赴太原，找到王若飞同志，有的接上了党的关系，有的申

请入了党，并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等抗日救亡工作。他们这种革命高尚品德，真令人敬佩。

任子良和我曾于1933年8月组织了“塞原社”，采取“以文艺形式，团结青年，进行革命”的方式，继续做革命工作。

1933年8月至1937年10月绥远省沦陷为止，先后在任子良、章叶频、袁尘影、李伟昌（笔名穆女）及我的主办下，以“塞原社”的名义在原绥远省文艺界发动组织过各种活动，繁荣诗歌文艺，甚为活跃，影响颇大，绥远民国日报、社会日报、上海光明、半月刊都著文赞赏，誉为“绥远文坛的巨星”。这方面的详情，章叶频同志已写回忆录，我不赘述。

现在我想在这里说说“塞原社”最初成立的宗旨、目的等情况。

任子良和我逃离中山学院之后，在河曲、府谷隐蔽了一段时间，1933年8月间，闻讯察哈尔有冯玉祥、吉鸿昌、张克侠等组织起抗日同盟军。察哈尔抗日形势好转，相应绥远抗日形势亦好转，因此，任子良和我便返回了中山学院就学。这时，我俩虽然没有和反帝以及党的组织联系上，但我俩没有灰心失望，不改革命初衷，遂采取“以文艺形式，团结青年，继续革命”的方式，来做革命工作。从而联系进步青年同学，组织了一个文艺团体“塞原社”。成员多为托克托县、凉城县同学中的老乡。有张斌、李杏元（笔名吟生女士）等，我们利用节假日，写文章抄写在学校内的墙报上，差不多每星期出一期。1933年冬（约11月12日）得到我的同乡，又是我小学时的老师，当时在绥远“社会日报”工作，思想进步的刘兴洛（又名刘继汉）的帮助支持，在“社会日报”副刊上取得一席之地，出版了《塞原》文艺刊。主要发表大众化文学，“普罗”文学，宣传抗日救亡。

“塞原”在“社会日报”副刊上出到第16期，这时到了1934年（约5月15日），由于稿荒，暂时停刊。此后，相继有中山学

院英文老师李伟昌、章叶频、袁生影，热心积极致力于恢复“塞原社”工作。这样就加强了领导，他们又都是能写的硬笔杆子，大家一致努力，自己写，又广征稿件，使“塞原”文艺刊从第17期起，在杨令德先生办的“国民日报”（后改称西北日报）副刊上复活了。

一个普通战士的回忆

——太原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一年生活的回忆

朱志国

前言

50年前，当疯狂的日本法西斯侵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大举入侵我国领土，欲将我国变为其殖民地，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的紧急关头，太原成成中学（以下简称成中）全校师生在校长刘瀾如等地下党领导下，放下教鞭书本，毅然投笔从戎，组成抗日武装，参加这场伟大、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支由青少年为骨干组成的队伍，初成立时叫“成中抗日义勇队”，其番号先后改称“成中师生游击队”、“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游击队第四支队”（简称动委会四支队）、“山西保安二区游击第四支队”。在晋西北转战10个月，1938年秋，奉命与八路军一二〇师李（井泉）支队一起开赴敌后绥远省大青山地区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入大青山后不久编入八路军的行列。广大师生和他们领导动员扩大来的数百名战士在蒙绥党委领导下，在李井泉、姚喆先后两位卓越的司令员直接指挥下，经八年抗日战争、三年多解放战争的艰苦奋斗，浴血奋战，足迹遍及大青山、蛮汉山、长城内外、内蒙草原，师生们实现了自己保卫祖国的誓言，尽了应尽的义务。13年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战争中献出了年青的生命，鲜血洒遍了大青山、蛮汉山、辽简的草原。全国解放后，绥远省、内蒙古自治区合并，部分幸存者仍在内蒙古党献军各系统与蒙族同志一道参加内蒙地区的四化建设，一部分分献在全国工、农、兵、学、商各条战线勤

奋地工作，多年来又有部分同志积劳成疾，病逝于工作岗位上。当年参加成中师生游击队的师生目前健在者尚无精确统计，曾在大青山战斗过的师生，据《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编者于1985年统计，幸存者仅20人，去年1986年夏天病魔又夺去了沙丁（阎时政）同志的生命，目前（1987年春）大概还剩19人。

光阴荏苒，转瞬已50年，当年的老师和部分高年级同学已进入古稀之年，年令最小的低年级同学也过了花甲。这支部队人数不算多，但是在号称全国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地区之一的大青山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胜利后又同挑起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胜利地解放了绥远省，成中游击队的师生们是有一定贡献的。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最初时期，正面战场国民党主力部队节节败退，日本侵略军长趋直入，国家危急，民族危急，华北一时处于混乱的状态，全国仅有这样一支由十几位文质彬彬的老师率领一群稚嫩的青少年组成抗日游击队，上前线杀敌，确是难能可贵的。在当时对神圣的抗战起了很大的号召和动员的作用，在国内国际发生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

成中游击队在大青山蒙汉杂居、地形复杂、气候严寒、周围敌伪据点林立、没有可靠后方可依托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几乎天天需要行军转移，时刻准备战斗，每年要应付、粉碎几次、十几次日伪联合大扫荡，有一个时期还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作斗争，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确也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每个同志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工作岗位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尤其是党领导学生运动的成功经验。

笔者1937年10月入义勇队到1938年11月初在大青山调出四支队刚好一年。时年16岁，当时系非党群众，在四支队任过战士、班长和一大队文书数月，系低年级学生，年幼无知、知之情况不多，文化低才疏学浅，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为了纪念成中游击队成立50周年，缅怀先我而逝的烈士同学、老师们草拟几稿回忆

四支队一年生活的感想以作纪念。

年久日长，又加年迈记忆力减退，可能会有这样那样不确切和差错，敬希读者指正。

一、成中师生游击队成立前后概述

（1937年9月24日至1937年11月8日）

（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掀起了抗日运动的高潮。

19世纪中叶以来，日本历代封建统治集团都把侵略中国变其殖民地为国策。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于1931年9月18日毫不费力地占领了我东北三省。1933年又占我热河省，1935年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23县自治政府，肢解了河北省。同时派兵支持蒙奸德王、李守信组织伪殷军占领察（哈尔）北各县进而侵犯绥（远）东妄图先行吞并整个华北，继而实现长期以来独霸中国的野心。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对日寇的侵略行径节节退让，一方面派政府要员与日寇秘密签订一个又一个的卖国协定，一方面集中大批精锐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围剿坚决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同时残酷地监禁、镇压、杀害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内战持续了10年之久，全国大小城市一派白色恐怖，全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了前来部署内战的蒋介石，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斡旋下，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事件得到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前途呈现出一线曙光。西安事变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迅速得到全国各族各界人士的热烈拥